



“反者道之动”丛书

# 反乌托邦

王建香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反者道之动”丛书

丛书主编 季广茂

# 反乌托邦

王建香 著

ANTI-UTOPIA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乌托邦 / 王建香著.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9

(反者道之动丛书)

ISBN 978-7-04-046057-5

I. ①反… II. ①王… III. ①乌托邦-研究 IV.  
①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8201号

反乌托邦

FAN WUTUOBANG

策划编辑 孙璐 责任编辑 孙璐 装帧设计 张楠  
责任校对 刁丽丽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印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6 字数 90千字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46057-00

# “反者道之动”丛书总序

季广茂

“反者道之动”一语出自老子的《道德经》第40章。

众所周知,《道德经》由《道经》和《德经》组成。《道经》以释道为本,与西人所谓“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做法不谋而合;《德经》专论为人处世之道,与西人所谓“人生哲学”(philosophy of life)的追求异曲同工。老子论为人处世,主张因时而动,顺应自然,所谓“弱者道之用”(《道德经》第40章),是也。与此不同,老子论道,虽然认定“道法自然”,却又以“反者道之动”一语,道破“道”的秘密:“道法自然”的基本方式不是顺势而为,而是逆势而动。

“反者”之“反”,既指相反、反对,又指返归、返回。前者是对立,后者是由对立重返统一。前者属于动力论(dynamics)的领域,后者属于目的论(teleology)的范畴。两者虽然密切相关,但毕竟颇为不同。而且前者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后者,因为后者不过提供了一种乌托邦愿景

( utopian vision ), 甚至只是一种幻象而已。

长流之水必有源，繁茂之树皆有根，对立和相对，亦非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要而论之，对立和相对，源于老子所谓的“道”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在“道”的内部，矛盾的双方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样的矛盾不仅源于“道”，而且见于“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仅凭常识即可发现，老子所言，是何等的英明：“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道德经》第2章）

也正是因为“道”有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它才具有如此简明和完美的动力机制，才能展示如此生机勃勃的内在动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这个动力呈现的过程，实即“道”的分化和外化的过程。自然界种种神秘莫测的变化，诸如“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道德经》第9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道德经》第16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道德经》第23章），等等，皆为道的分化和外化之结果。

书于2500多年前的《道德经》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对我国，而且对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透过它的视角，以我国固

有的传统智慧 (conventional wisdom), 来审视西方现当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 不仅是有益的尝试, 还会带来诸多的裨益。以往我们总是透过西方的视角, 审视我们的现实。现在, 我们也可以透过中国的视角, 把握西方的事态。至少, 我们可以据之描述西方现当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面貌、特征和走向, 发现其“有无相生”的基本规律。

进入 20 世纪后, 西方思想界、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开始大规模地对近代以来的诸种文化思潮 (这些思潮通常被冠以“现代性”之名) 和社会思潮进行广泛、深入和长久的反思, 甚至进行激烈的反抗或彻底的反叛。作为如此反思、反抗和反叛的结果, 种种“反”字当头的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开始大量涌现。它们不仅对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且给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反启蒙、反文化、反建制、反英雄、反艺术、反唯实论、反乌托邦、反全球化、反现代化、反智主义、反美主义、反人本主义、反权威主义、反女权主义、反民族主义、反消费主义、反基建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科学主义等等“反”字当头的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 均为“反西方”的“西方主义”, 因而呈现令人眼花缭乱的悖反

(antinomies)之势：是“西方”的，但常常打着“反西方”的大旗；虽然“反西方”，毕竟还是没有跳出“西方”的窠臼，没有消除“西方主义”的嫌疑。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它们不只是对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反叛、反抗、反击、反驳、反感、反攻倒算、反唇相讥、反目成仇、反其道而行之，而且是对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反观、反思、反省、反刍和反馈。从这个意义说，“反”派思潮也是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另一面，甚至是对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深化和延续。从长远看，它们不仅没有阻止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发展，反而推进了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进程。

西方的现当代思想史和社会史就是由“正”而“反”的历史，而“反”不是对“正”的简单否定，而是对“正”的调整和强化。由“正”而“反”的过程，也是黑格尔所谓的“扬弃”的过程。与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相比，黑格尔的“扬弃说”能使我们更好地领悟“正”与“反”的互动关系。

在黑格尔看来，“扬弃”是对全部直接的、物质性的传统和现实的直接扬弃，是对被扬弃的传统和现实的语

境的彻底剥离。扬弃把被扬弃之物的大量丰富的特征、属性，化约为固定、僵死的规则、符号和原理，因而无异于是对被扬弃之物的“羞辱”。一旦被扬弃，一旦经历了如此的“羞辱性过程”（mortifying process），被扬弃之物的生命的直接性就会暂时丧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扬弃的过程是从“绿色”的生命直接性迈向“灰色”的概念性结构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本质性的决断”（essential determinations），而我们无法凭借直接的经验来认识和把握这种本质性的决断。倘若没有经历扬弃的过程，倘若我们一味注重现实、历史和传统的“正”的一面，而忽略其“反”的一面，我们的认识就会永远处于原始的认知状态。

柏拉图就曾经把“现实性”化约为“可能性”，把“实然性”化约为“应然性”，因为他总是把理念赋予事物，而把理念赋予事物，就是把某个“道义之维”（deontological dimension）赋予该物：不仅指出它是什么，而且指出它应该是什么，使“应该是什么”成为我们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真正现实的核心，同时凸显真正现实的内在潜力和丰富的可能性。

这是化约，这也是决断，化约和决断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化约和决断，恰恰是扬弃的两个方面。通过化约



和决断（即扬弃）来审视世界，其实就是透过众多潜在性之镜（lenses of the potentialities）来领悟周围世界的现实性。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通过化约和决断（即扬弃）来审视世界，就可“设置”周围世界的现实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派思潮可以使我们的认识登上新台阶，进入新阶段。透过它们，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西方思想的最新走向，而且可以明察西方思想发展的内在机制。

或许这就是这套书的价值之所在。

#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反乌托邦、敌托邦与乌托邦 /005

第二章

反乌托邦中的反现代性 /027

第三章

反乌托邦中的反科技主义 /055

第四章

反乌托邦中的反极权主义 /083

第五章

反乌托邦中的反消费主义 /105

第六章

反乌托邦中的反性别主义 /125

第七章

反乌托邦的述行性 /147

主要参考文献 /171

后 记 /175

## 绪论

反乌托邦 (anti-utopia), 作为一种讽刺和批判手法, 一直与乌托邦如影随形。乌托邦有乌托邦叙事、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实践“三副面孔”, 想象、建构或践行一种理想社会模式, 尤其是马克思、布洛赫、马尔库塞、列斐伏尔、詹姆逊、伊格尔顿等大家都曾著书立说, 从不同侧面对乌托邦思想进行了阐述。作为一个 19 世纪末从乌托邦中衍生出来的西方现当代文化思潮, 反乌托邦是通过虚构一个比现实世界要糟糕得多的社会, 从思想上揭示乌托邦在某些方面的不现实性和荒诞性, 同时帮助读者反观、批评、警醒乃至改善现实社会。虽然它们都是出于对现实的关切和对未来社会的希冀, 但与乌托邦展示的人人憧憬早日实现的完美世界不同, 反乌托邦勾画的是一幅幅地狱般的惩罚性图景, 是谁也不愿意看、更不愿意体验的恐怖世界。因此, 作为“一种反抗或批

判的能量或精神”<sup>[1]</sup>，一种“社会行动的话语”<sup>[2]</sup>，反乌托邦通常以小说这种虚构叙事形式（到了20世纪后期又增加了电影、戏剧等重要的反乌托邦叙事形式）对诸多现实问题进行表征，并冀图达成以言行事的目的。

反乌托邦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生存危机感和社会焦虑意识的产物。19世纪后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科学技术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人们也沉醉于这种舒适的物质生活，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被滥用，社会物欲横流，权力膨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更是给人们的身体和心灵造成了永久性创伤，恐怖主义、极权主义的乌云笼罩，工业主义、消费主义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

在反乌托邦叙事中，科学、技术、进步、正义、自由、平等、理性等人们崇尚的现代性宏大叙事开始全面受到质疑和反思。由于其反乌托邦和反现代性的双重特征，西方社会和乌托邦小说中曾经引以为傲、奉为圭臬

[1] Keith Booker, *Dystopian Literature: A Theory and Research Guide*,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4, p. 3.

[2]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p. 119.

的现代性，在反乌托邦叙事中恰恰成了将人类带入永久黑暗甚至引入地狱的恶魔。它们通过或描写一个所谓的乌托邦世界，一个看似完美、实则是一个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愿生活在其中的可怕世界，或将现有社会极端化，呈现一个真正的“反乌托邦”社会，将一个满目疮痍、令人震撼的噩梦般的世界呈现在受众面前。反乌托邦叙事中通常从反科技主义、反恐怖主义、反极权主义、反消费主义、反本质主义、反生态破坏等视角，对人类社会的某一（些）方面出现的严重问题进行揭示和批判，表达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和文本介入，并以此为受众提供一种非常有益的警告，帮助他们反思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中的荒唐行径，达到避免人类文明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目的。

反乌托邦传递的究竟是希望还是绝望，是逃避还是正视？本书试图根据曼纽尔·库玛、萨金特、莫伊兰、布克等著名的（反）乌托邦研究专家的观点，以及爬梳散落在布洛赫、马尔库塞、阿多诺、阿尔都塞、巴赫金、列斐伏尔、詹姆逊、伊格尔顿等大家的著述中关于反乌托邦的重要思想，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正如一位学者在谈到反乌托邦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时所说，反乌托邦是试图在“希望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起到一种调停作

用<sup>[1]</sup>。虽然从表面上看，反乌托邦世界中充满各种恐怖景象，而且虚构世界中的人物对问题的解决或对权力的抵抗大多有限且以失败告终，但反乌托邦并不是愤世嫉俗，或对社会、政治不关心，更不是反社会；它们并不是简单地反对现代文明思想，更不是反对一切新的、先进的东西，或鼓吹回到原始的荒蛮世界。恰恰相反，它们担心甚至感到失望愤怒的是在将现代性思想付诸实践时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民主变成暴力和独裁政治；科学和理性没有帮助人类走向进步，理性变成了非理性，科学技术不是真正为人类服务，反而给社会、自然和个体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因此，它们反对的是将现代性理念神化，加以无节操地膜拜和无节制地运用，而无视它有可能带来的严重的副作用。反乌托邦体现了对现代社会出现的环境问题、性别问题、科学技术与伦理失衡、权力集中与民主失衡、消费社会中人与文化的扁平化问题等这些“难以忽视的真相”无比的焦虑和关切。

[1] Darko Suvin, *Positions and Presuppositions in Science Fiction*.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3.

## 第一章

# 反乌托邦、敌托邦与乌托邦

寻找和构建理想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终极追求，也是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的重要旨趣。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似乎自有文字记载开始，就都以各种不同方式建构着自己的理想社会。无论是古希腊罗马传统中的“黄金时代”、世外桃源（Arcadia）、乐土（Cockayne），《圣经》传统中至美至纯的人类天堂伊甸园或建立崭新世界秩序的千禧年，还是柏拉图等级分明、各司其职、哲学为王的“理想国”，都试图建构理想的社会模式。在我国，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和“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以及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亦无不具有乌托邦社会特性。

自英国政治家、文学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用拉丁文写成的《乌托邦》（*Utopia*, 1516）问世以来，“乌托邦”就成为了理想社会的代名

词。通过现实与理想的对比，该小说以虚构的形式<sup>[1]</sup>构建了一个政治民主、财产公有、人民平等、按需分配、宗教自由、邻邦友好、崇尚知识的共和社会。著名的乌托邦小说评论家库玛（Krishan Kumar）说：“不管后来的小说以何种方式到达乌托邦，究竟是空间位移到很遥远的地方还是时间前进到遥远的未来，抑或只是南柯一梦，它们对乌托邦的描写大多是遵循莫尔的模式。”<sup>[2]</sup>而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 1627）构建的乌托邦是一个科学与技术占主导地位的未来社会，

[1] 从其定义及属性来讲，所有的乌托邦、反乌托邦作品都是虚构作品，都属于想象性文学，甚至可以说都具备小说的特质。即使一定要严格区分乌托邦小说、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实践，乌托邦小说也是其中最突出、影响力最大的一支。详细论述见 Krishan Kumar, “Aspects of Western Utopian Tradition,”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6.1 (2003), pp. 63–77。因此本书主要以乌托邦 / 反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关注乌托邦小说、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实践三分法参见 Lyman Tower Sargent, “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Utopian Studies*, 5 (1994), pp. 1–37; Lyman Tower Sargent, *Utopia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Gregory Claeys, “News from Somewhere: Enhanced Sociability and the Composite Definition of Utopia and Dystopia,” *The Journal of History*, 98 (2013), pp. 145–173 等。

[2] Krishan Kumar, “Aspects of Western Utopian Tradition,”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6.1 (2003), p. 70.



在这个国度中，不仅国王宽仁大度，一切为了国人谋幸福，而且尊重科学、倡导科学、崇尚科学。科学家受到上帝般的尊重和敬仰。自此以后，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们通过作品表达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希冀：或为更理智民主的政治体制、更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更自由完美的精神追求，或为更怡人的自然环境，等等。

通常来说，一个社会只有在物质、社会、精神三种需求同时得到满足，只有人、社会、环境之间达到真正的和谐时才能称其为理想社会。但现实社会却往往厚此薄彼。尤其是 19 世纪中期以来，三者之间出现了极度的不平衡：一方面是科学技术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人们也沉醉于这种舒适的物质生活，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被滥用，社会物欲横流，权力膨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长期以来人们希冀的乌托邦理想似乎变得遥不可及。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物质进步这些原本人们憧憬、寄予厚望可赖以推动社会发展、改善生活条件、真正实现幸福的“良方”，现在却似乎成了一剂剂“毒药”，不仅对人类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甚至大有要颠覆、毁灭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信念之势。因此，一些严肃的、有良知的小说家开始对理想社会的建构采用一种“否定